

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 臺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 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

徐火炎**

本文認為要了解臺灣在解除戒嚴前後的政治民主化轉型，除了必須考慮到總體層次的經社發展與變遷結果、國內外的有利環境條件外，更重要的是不能偏廢或忽略生活在轉型過程中選民大眾的態度、價值與行為等個體層次上的改變。

作者檢視解嚴前後歷次選舉投票結果的政黨得票比率之變化，發現這段期間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競爭的勢力消長，呈現出一種「持續性的政黨重組」現象。這種政黨重組的趨勢與解嚴前後的民主化過程，具有相合致的同步發展。本文利用民國72年至78年之間三次增額立委選舉與80年第二屆國代選舉的全省性調查資料，來分析選民在解嚴前後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改變。分析的結果，一方面發現解嚴前後的持續性政黨重組現象，主要是中立的選民逐漸具有黨派性的一種變遷結果，另方面也發現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會影響他們對政黨的偏好，而且兩者也決定了選民的黨派投票。個體層次上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改變，可以視為是推動臺灣政治在總體層次上、走向競爭性政黨政治與民主化發展的重要驅策力量。

- 一、引言
- 二、選舉、民主轉型與政黨的重組
- 三、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
- 四、研究問題、資料來源與變項的測量
- 五、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

* 本文蒙兩位匿名評審先生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特此誌謝。此外，本文的部份資料與分析曾分別在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本所政治組學術研討會中宣讀過，並經許多參與同仁的評論，若沒有上述諸位的意見，本文一定失色不少，特此表示謝意。作者雖參酌許多不同的評論意見，但疏漏之處在所難免，也應責成作者本人。本文初稿曾獲民國八十一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特此誌謝。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六、選民政黨偏好的改變與持續性的政黨重組

七、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的影響因素

八、結論

一、引言

民國75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為「民進黨」)宣布成立；接著在民國76年7月14日，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規範政黨的「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也相繼在78年1月底公佈實施。隨著戒嚴的解除與黨禁的開放，政黨政治在臺灣的發展也邁進了一個嶄新的紀元。從民進黨的組成、戒嚴的解除、黨禁的開放、到在野政黨獲得合法地位保障等一連串的變革，毫無疑問地是臺灣政治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變革。這些政治變革不僅開啓了臺灣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大門，同時也打破了長久以來國民黨一黨主宰的威權統治格局。基本上，這種從一黨主宰的威權統治，走向競爭性政黨政治為導向、以建立民主憲政為內涵的政治變遷過程，可說是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

以發展的時序來說，臺灣的確在歷經三十多年高度經濟成長後的1980年代中期，才從威權統治的格局掙扎出來，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就發展的結果而言，臺灣的民主轉型，頗能符合早期現代化理論對於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關係的看法，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現代化的結果，會導致政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改變。(Lipset, 1959; Cnudde and Neubauer, 1969)研究東亞國家政治發展的學者Lucian W. Pye (1985: 233)即認為臺灣的民主轉型乃是現代化理論的典型例子；他並且指出臺灣過去三十多年來的經濟成長與進步，帶動了近年來的社會多元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趨向。姑且不論現代化理論能否用來解釋臺灣政治民主化轉變的因果關係，臺灣經濟發展的奇蹟與成就，則是舉世皆知的不爭事實。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之間，固然會具有相互的影響關係，但若沒有其他有利條件的配合，高度成長的經濟不一定就會促成政治的民主化發展。Samuel P. Huntington (1984:

201-2) 在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展望時，指出：「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之時，它就可被視為邁進了政治轉型或面臨選擇的地帶，亦即傳統的統治形式逐漸無法維持，而有賴新的政治制度來處理日漸複雜化社會中人民的需求與政策的執行。… 經濟的發展固然會迫使傳統的政治制度改變，但究竟改變後的新政治體制究竟如何，則端視其他的社會文化、統治精英的價值取向與外在影響等因素，是否能配合而定。」從 Huntington 的話加以引伸，我們在探討為什麼臺灣能從傳統的威權政治體制之路轉向民主化體制改革之道時，除了要肯定臺灣經濟發展事實成就外，還要考慮到大環境的影響，例如，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美國的影響、以及臺海兩岸敵對的緊張關係趨於緩和等，這些外在的影響都有助於我們了解臺灣在 1980 年代中期的民主轉型。

臺灣自宣布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後的政治變遷，即是少數新興工業國家中，在經濟發展起飛後，成功地走向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同步發展的例子之一。然而從上述經濟成長、社會現代化、及外在有利影響等總體層次的因素，來探討臺灣的民主轉型，固然有助於我們了解臺灣政治民主化的先決條件與時空背景，但總體層次的分析與說明，不免傾向於看林不見樹，而忽略了要求與促動政治民主化轉型之種種個體層次的因素。正如 Huntington (1971: 310) 在一篇檢討現代化理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總體的經社發展與總體的政治變遷之間所發生的關係，必須是透過個人態度、價值與行為等個體層次的變遷而產生的。」當我們在思索解答臺灣的民主化轉型時，我們不禁會問：一個浸潤在儒家威權文化傳統、長久來習於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人民也普遍過著豐衣足食生活的臺灣社會，為什麼新的競爭性政黨政治與挑戰威權統治的民主改革，會發生在經濟仍然持續成長與社會依舊均衡穩定發展的 1980 年代中期？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僅側重於總體層次上造成臺灣民主轉型的經社發展程度與外在有利因素，而忽略了生活在這些時空環境與經濟條件中統治精英與一般民衆的態度、價值與行為等個體層次的因素；因為只有透過統治精英的決定與民衆的行為，一個社會的變革才能成為事實。

就個體的層次而言，毫無疑問地，統治精英的正確選擇，正如 Huntington 所指出的，對一個國家朝著那個方向改變發展，具有重大的決定性作用。雖然統治精英的態度、價值與行為，對一個國家面臨政治上的重大轉變過程中，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但一般大眾的態度、價值與行為亦不能就因此而被偏廢或忽略。尤其在臺灣的政治時空中，國民黨的統治精英為贏得民衆的支持，以鞏固因「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的凋零而逐漸喪失地域代表性「法統」的統治正當性基礎，所以在做成重大的政治決策時，勢必同時也考慮到民衆集體衆趨的態度、價值與行為，究竟會如何反應的問題。本文即嘗試從解除戒嚴前後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的偏好態度與黨派投票行為等個體層次的變遷，來看臺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選舉與政黨勢力的消長。上述所指出的總體層次之經社發展與外在影響因素等時空條件，以及個體層次的統治精英之價值與選擇行為等，都視為本文在討論選民大眾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及黨派投票變化的外在既定背景因素，除非必要否則不再文中申論。

二、選舉、民主轉型與政黨的重組

由於現代的民主政治基本上就是選舉與政黨政治，這兩者固然是民主政治過程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經驗上觀察一個社會的政治是否民主的指標。觀察臺灣選舉過程與政黨勢力的變化，不僅可以了解選舉與政黨勢力的消長，同時說明這兩者對臺灣民主化轉型的作用。臺灣的選舉不僅只是選民表達政治意願、選擇民選公職人員的一種政治參與管道而已，基本上也是一種由下而上推動政治變遷的力量。一方面，透過民國39年就開始舉辦的地方自治定期選舉，以及自民國58年來擴大到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舉，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在經濟穩定成長的1970年代，也開始朝著自由化的方向改變，亦即由「硬性的威權主義」逐漸轉變成「軟性的威權主義」(Winckler, 1984)。另一方面，在社會與經濟自由化逐步擴大的趨勢下，選舉也成為朝野異議人士與民主改革運動的競技場，經由選舉的過程，反對的在野勢力得以影響、動員

及組織它的支持者，終於在民國75年9月28日宣布民進黨的誕生。

臺灣的選舉，毫無疑問地可以說是現代政黨政治的催生者。近年來臺灣所以能夠從威權政治體制順利走上政治民主轉型的方向發展，選舉的實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主導力量。假定沒有自五〇年代起就實施的地方選舉，我們很難想像在儒家威權文化傳統的臺灣社會，會容許出現今天挑戰執政當局的反對黨、以及轉變成一個比較開放競爭的政黨政治局面。同樣地，如果沒有長久來的選舉政治，我們也很難理解列寧式政黨的國民黨，¹ 會率先採行「黨內初選制」來提名候選人。未來競爭性政黨政治的進一步發展與健全政黨制度的確立，無不與選舉發生密切的關聯，而選舉投票的結果不僅會改變政府人事的重組、政策的改變、以及政黨競爭的性質與政黨勢力版圖的變化等。定期的選舉與政黨政治出現，不僅是促進與牽引臺灣民主轉型的動力，同時公平公正的選舉與健全的政黨競爭，也是維繫臺灣的民主政治是否能鞏固的主要關鍵。因此，從探討解嚴前後選民對政黨的態度與選舉投票行為之中，一方面我們可以了解臺灣民主轉型過程中選民政黨支持的變化，另方面也可進一步藉以觀察臺灣未來政黨政治的發展趨向。

從解嚴前後的各次增額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選舉來看，選民的黨派投票結果，如表一所引的數據顯示，「黨外」在民國69年中美斷交後恢復的增額立委選舉中，僅獲得不到10%的選票，然而隨著「黨外」逐漸組織化與共同的選舉政見的訴求，在民國72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中，得票率則劇增至17%左右。自民國73年至75年之間，許多引人議論與批評的政治與社會重大問題，如：「江南案」、「十信案」與華航貨機被劫至廣州等事件，對國民黨執政的公信力構成了莫大的傷害；同時「黨外」也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會」的準政黨組織，並於全省設立分會，直接向國民黨的黨禁挑戰而進入了「黨外」與國民黨由學者居中協調的階段。民國75年12月增額立委選舉的來臨，為民進黨的宣布組成催生，而甫在9月底匆促成軍的民進黨，卻也能在12月的立委選舉中，獲得22%左右的選票支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後的民國78年增額立委選舉，也是民進黨的黨名首次出現在選票的選舉，民進黨的總獲票率

達28%。黨禁開放與「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的立法公佈實施後的短短三年中，在野政黨紛紛宣布成立，數目高達68個之多，但80年12月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結果，卻肯定民進黨仍舊維持在野的第一大黨，總獲票率達有23%左右。

表一：選民的黨派投票，民國69年至78年立委及80年第二屆國代選舉

	69年	72年	75年	78年	80年
國民黨	73.6	72.9	69.1	60.6	71.7
(黨外)民進黨	(8.3)	(16.7)	22.2	28.2	23.4
其他黨(或無黨派)	18.1	10.4	8.7	11.2	4.9

資料來源：(1) 中央選委會所發佈的選舉結果資料；

(2) Hu Fu and Yun-Han Chu (1992: 183)。

從表一中增額立委與第二屆國代的各次選舉來看，國民黨的得票率自民國69年選舉後逐次下降，而至民國78年選舉跌至谷底；而「黨外」及以後的民進黨在總獲票率方面卻逐漸上升。其他黨或無黨籍候選人的總得票率，也在「黨外」逐漸組織化及民進黨宣布成立後而逐漸減少，甚至在民國80年12月的第二屆國代選舉中，無法獲得分配不分區比率代表名額之5%的門檻。從解除戒嚴後的增額立委與第二屆國代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政黨勢力的消長趨勢：一方面，國民黨的總得票率從69年至78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之間，減少了13%的得票率，民進黨的總得票率卻由69年「黨外」時期的8.3%，增加到78年首次以黨名競選增額立委時的28.2%，得票率增加幾達20%；另方面，無黨籍候選人或其他政黨的得票率，也減少7%左右，以民國80年第二屆國代選舉的得票率而言，無黨派或其他政黨甚至可說幾近消失於臺灣的選舉舞臺。雖然在民國80年底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立、監委與國大代表)全面退職以前，臺灣地區的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結果，不會影

響也無關於政府的重組，只是增額代表的更替而已；就從選舉的結果中，亦可看出國民黨仍然是選舉的贏家，得票率的降低只在於說明民進黨逐漸壯大的競爭結果，事實上並沒有威脅到國民黨執政的地位。然而，若從無黨派與其他政黨候選人得票率也逐漸降低的改變來看，解嚴以後政黨在選舉政治中的勢力消長，可說是朝向兩黨選舉競爭的方向發展。

從上述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政治中勢力的消長趨勢，我們可以看出解除戒嚴前後所發生的一種「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現象。政黨重組的概念可溯源到V. O. Key (1955, 1959) 早期對美國選舉中政黨勢力消長的研究，他指出政黨的重組有兩種類型，亦即：「關鍵性重組(critical realignment)」與「持續性重組(secular realignment)」。所謂「關鍵性的政黨重組」，乃是指出一種明顯而大量的黨派投票改變，這種黨派投票大幅度改變的選舉稱之為關鍵性的選舉(critical elections)，其結果會導致一個在野黨擊敗一個執政政黨，而且在以後的好幾次選舉之中仍然能夠維持勝選的優勢。「持續性的政黨重組」則是指逐漸而緩慢的黨派投票改變而言，即每次的選舉都導致少部分的選民轉而投票給另一政黨的一種改變，而這種持續性重組的結果或許會改變，也可能不會改變選民中政黨的勢力版圖。Key 對政黨重組的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建構選舉分類的理論，² 他所根據分析的資料，基本上乃是一個選區中選民投票給政黨的總投票記錄(aggregate voting record)，而研究的分析單元則以市、鎮與州等地理區位為主。

根據 Key 的看法，「重組性的選舉」是指出現選民政黨分歧的基礎改變，而重新調整政黨政治權力結構的一種選舉，但若選民政黨分歧改變的幅度鉅大而構成某一黨因此而連續勝選，則這種選舉即為關鍵性的選舉類型；若改變的幅度很小並沒有影響政黨政治的權力結構，則這種選民政黨分歧基礎的改變則稱為「持續性的政黨重組」(Key, 1955; 1959)。Key 乃是運用選民在選舉中黨派投票總體分配結果之改變，來推測選民對政黨效忠之心理承諾的改變，以作為探討選舉分類與政黨重組的根據。然而自「密西根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從事研究美國 1948 年及以後的歷次總統大選以來，「政

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才被發展與運用於探討選民與政黨之間的心理橋樑。換言之，從密西根大學的選舉研究開始，選民對政黨認同的一種心理依附感，就被視為是決定選民投票支持某一政黨，或構成選民黨派分歧的心理基礎。密西根大學選舉研究小組的 Philip E. Converse (1966) 則更進一步認為，選民若根據他們的政黨認同來投票的情形，可以稱之為「慣常性投票(normal vote)」。假定選民的黨派投票依據久已形成的政黨認同來決定，而在投票的總體面來說，即形成慣常性投票與一種穩定的政黨組合(party alignment)。所以，自密西根發展應用政黨認同概念以後，選民的政黨認同與選舉結果的政黨勢力消長的關係，不僅成為探討選舉分類的主要依據，也是觀察分析政黨重組現象的重心所在。

若從選民政黨認同的改變，來看政黨之選民基礎的變化，我們則可以進一步區分出政黨的解組(dealignment)與重組等兩種現象。「政黨解組」所指的是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逐漸喪失對原來政黨的依附感或效忠而言，以致於造成原來的政黨，在選區或全國的權力結構中，發生了勢力版圖的改變。(Inglehart and Hoschstein, 1972) 政黨解組的結果可能有二種；一種結果就如同美國自 1960 年代以來所發生的情形一樣，導致了一類不認同任何政黨之「中立選民」的人數逐漸在增加中的趨勢(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9; Wattenberg, 1984)；另一種可能情形是引起政黨的重組，即一部分的選民從認同於一個政黨改變到效忠另一個政黨的現象。然而，不論要分析政黨的解組或探討政黨的重組，都需要從個體層次的選民政黨認同之變化，來加以觀察分析。

三、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

在臺灣的政治社會中，選舉的作用不僅只是選民表達政治意願、選舉公職人員的一種政治參與管道而已，更重要的是，選舉過程本身即是民主政治理念的傳播與實驗場所。對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社會來說，民主政治的觀念與制度確實是晚近輸入的西方外來之政治文化。民國 36 年所頒布施行的

憲法，雖然在制度設計上具有民主的精神，但由於戒嚴令的宣布與臨時條款的訂定，民主的制度設計反而成為威權統治的法統基礎。尤其，在儒家文化強調和諧、階序與人治的傳統下，加上長久來兩代蔣家強人的威權統治，我們不難見證民主政治文化在臺灣社會生根的困難。然而，為了對比與凸顯出中共在大陸實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統治，實行威權統治的國民黨仍不忘以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和推行民主政治為政治號召，而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中，也推動民衆參與的地方自治選舉與逐步擴大的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舉。這種中央威權與地方民主並行的「兩元政治」，毫無疑問地讓選民有機會在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及投票選舉的過程中，去體驗參與民主政治運作過程、接受民主政治的價值觀念。但在海峽兩岸敵對關係未趨緩和的情勢下，國民黨一方面固然會時時刻刻提醒選民，威權統治所締造的政治穩定與有利的經濟發展環境之事實，另方面也不會忘記向選民強調儒家傳統一元化和諧共識的價值，而貶損西方民主多元社會的政治紛爭和權力制衡的弊病。所以，當我們嘗試去了解國民黨如何在實施三、四十年的兩元政治的穩定統治之下，從「硬性的威權主義」逐漸轉化到「軟性的威權主義」，乃至於朝向解除戒嚴令的民主化方向？以及解釋一個開放性政黨政治文化，如何在強調儒家文化傳統的臺灣政治社會浮現？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必然不能無視於臺灣人民大眾的民主價值取向、對政黨的態度與偏好，以及投票行為的改變。

進一步從發展中的拉丁美洲國家與東亞四條龍中的臺灣、南韓與新加坡等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這些成功的新興工業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發展，常常與官僚的威權統治攜手並行，而且成功的經濟成長也構成威權統治得以延續的最有力基礎。(O'Donnell, 1973; Cumings, 1984)因此，在一個沒有民主政治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假定普遍的民衆沒有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沒有民主改革的需求，經濟發展的成功也許正如Huntington所指出的，只是把社會推進到一個轉型地帶，不必然就會自動朝著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所以，就臺灣的民主轉型而言，我們認為在解除戒嚴之前的社會與經

濟自由化環境下，隨著選舉的擴大與經濟發展所帶動的種種社會現代化的影響，民衆已經逐漸具有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同時對民主政治改革的需求也增強。民衆這種逐漸增強的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與民主政治改革的需求，不但會影響他們對反對黨的接受程度，同時在選舉投票時，也會影響他們的黨派投票的方向。換言之，民主政治價值取向與政治改革需求較強烈的民衆，可能也較傾向於樂見反對黨的出現或成長，以期待反對黨可以扮演實踐民主政治所需的政治制衡力量。

從上面表一中解嚴前後各次選舉結果的政黨勢力消長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獲得選民黨派投票支持結果的變化，基本上乃是一種持續性政黨重組的現象。但，總體層次上的持續性政黨重組現象，究竟是如何透過選民政黨認同而改變、以及透過那些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來形成？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從個體層次上，去探討選民政黨認同的心理依附感與黨派投票抉擇為何。因此，本文所要探討與分析的重點，即在於分析解除戒嚴前後，民衆的民主政治價值是否增強？民衆的民主價值取向是否會影響他們對反對黨的態度？民衆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的偏好是否與他們的黨派投票行為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從解嚴前後各次選舉中，選民在態度、價值與行為等個體層次上的改變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來了解臺灣在解嚴前後總體層次上的民主轉型過程。

四、研究問題、資料來源與變項的測量

1. 研究問題

如上所述，本研究所要分析探討的問題有二：首先，在於分析解除戒嚴前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獲得選民投票支持變化的一種持續性政黨的重組現象，是如何透過選民政黨認同而改變、與透過那些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來促成；其次，在於探討民衆的民主政治價值取向是否在解除戒嚴前後有增強的趨勢，民衆的民主價值取向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及黨派投票抉擇。本文的研究主旨不僅企圖透過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

的關係，來了解臺灣解嚴前後民主轉型中個體層次的變遷過程，同時也在於呼應 Paul A. Beck 在回顧與檢討選舉投票行為研究時所指出的：在選舉行為的科學研究上，「投票抉擇雖然重要，但不是選舉行為研究中唯一最重要的問題。學者也必須要探討那種超越一次選舉投票的環境因素，如各次選舉共通的選舉行為模式；此外，研究者也必要關懷選舉結果對整體政治與政策的影響後果…。」(Beck, 1986: 241) Beck 所指「共通的選舉行為模式」，也就是橫跨許多次選舉而存在的政黨重組現象。政黨的重組不僅改變了一個政黨的選民基礎，同時影響所及，選區中政黨政治的權力結構也會隨之而變；因此，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必須也隨著這些改變而調整政策主張與競選訴求；所以，上一次選舉中的政黨重組也構成下一次選舉的環境背景。基本上，本文分析旨趣就是嘗試利用既有的各次選舉研究之資料，一方面在於發現臺灣在解嚴前後共通的選舉行為模式，另方面則在於從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的改變中，尋求解釋這種共通選舉行為模式的形成。

2. 資料來源

由於受限於可用的資料，本文所要探討的時間範圍是民國 72 年至 80 年之間、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其中，72 年、75 年與 78 年等三次選舉的研究資料為增額立委選舉，80 年的資料為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後舉行的第二屆國代選舉。這段時間橫跨民國 76 年的解除戒嚴及民國 78 年的「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完成立法實施而正式黨禁開放。在這段期間中，臺灣的經濟仍然持續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從 2600 美元急遽爬升到 7700 美元左右，外匯存底亦高達 700 億美元而高居世界第二位；台幣的大幅度升值與民間資金的釋出，也造成社會上金錢遊戲的盛行與物價的飆漲，自力救濟與街頭抗爭運動也逐漸趨於頻繁。從探討這段在解嚴前後的各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我們相信不僅可以觀察臺灣民主轉型過程中選舉的政黨政治，同時也可以探討臺灣社會鉅變中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

本文所據以分析的資料，主要來源有兩部份：第一，關於 72 年、75 年

與78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的調查資料，乃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大學政治系胡佛與陳德禹等教授主持「臺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計劃下，執行所收集之全省性選民的抽樣調查資料。第二，關於民國80年的第二屆國代選舉資料，也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伊慶春教授主持「臺灣社會意向」計劃，而由徐火炎、游盈隆、朱雲漢與吳乃德等教授所執行的「第二屆國代選舉」子計劃之研究調查收集得來，受訪的選民對象亦為全省性選民母體所抽出的樣本。

3. 變項的測量

在本文中所謂的「民主價值取向」乃是指選民對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內涵的民主信念具有自覺正當而言。³操作定義的測量題目，見附錄一所列問題項目，在資料的量化上採Likert氏七等分強度來計分測量。民主價值取向的測量，只出現在民國72年、75年與78年等三次增額立委選舉的調查研究上，然而在80年第二屆國代選舉的調查研究中，民主價值取向的測量題目並沒有被應用，但在該次研究的問卷設計上，有一組測量選民關於政黨選舉競爭的民主信念與解嚴後民主展望的評估題目，如附錄二。民國80年第二屆國大代表的選舉研究中，有關選民對開放性政黨政治與選舉競爭的民主信念，為了與「民主價值取向」以示區別，而稱之為「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民主價值取向與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雖然以不同的測量問題來施測，但其主要的目的不外在於觀察選民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價值信念或態度。

有關政黨認同的概念與測量，最早當然可追溯到密西根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的選舉研究。(Campbell et al., 1960)然而在解嚴以前的臺灣，選民長久處於國民黨一黨主宰的威權統治下，雖有定期的選舉但卻沒有相對等而可以和國民黨競爭的在野黨存在，因此在選民心中具有意義的政黨認同對象，可說僅是國民黨一黨而已。同時，也因為臺灣的選舉制度是所謂「一票多席位」的大選舉區制，在此種選舉競爭的環境下，選民對政黨的認同或心理傾向，與候選人或競選議題立場的影響比較而言，並不是決定選民投票的重要考慮。所以，在過去的研究之中，對於政黨的影響都以是否「加入(國民黨)

政黨」來處理，並據以推測選民的政黨認同，而不是從選民對政黨的心理依附感之角度來測量。

然而，在解嚴前後的選舉中，不論是具有準政黨性質的「黨外」組織，或民國75年9月以後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中已有共通與鮮明的政治訴求，例如：黨外時期所強調的政治制衡、臺灣的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自決、開放黨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以及民進黨在第二屆國代選舉所主張的總統直選、制憲與臺獨建國等議題，都可能在選民的心中構成深刻的印象。在經驗的研究上，由於受到既有資料的限制，同時也必須顧慮到不同資料在測量的共通性問題，所以本文只能從「政黨偏好」的面向來看政黨認同。⁴就歐美有關的研究發現來說，雖然政黨認同與政黨偏好所強調的面向並不一定相同，但兩者卻具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兩者的測量可互為替換(Wattenberg, 1981)。本文所據以分析的資料中，關於政黨偏好的測量方法乃是讓受訪選民表示他們對國民黨與「黨外」(民國72年)或民進黨(民國75年9月以後)的主觀上的傾向、偏愛或喜歡程度，同時也採用Likert氏七等分的強度來計分測量。有關本文引用的各次選舉研究對政黨偏好的測量題目，請參考附錄三。

五、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

1. 民主價值取向

基本上，我們同意上引Huntington對經社發展與政治變遷之間關係的看法，認為總體的經社發展乃是透過個體層次之個人的態度、價值與行為等改變，才對總體的政治變遷構成影響。就臺灣的政治從戒嚴時期威權統治改變到民主化轉型期而言，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的現代化，不但改變了臺灣的社會與經濟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生活在這轉變社會之中個人的態度、價值與行為。以下，我們從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來看解嚴前後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個體層次的變化。

從表二關於選民在72年至78年之間具有民主價值取向人數百分比的變

化來看，我們發現選民中具有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民主價值取向的人數，都普遍增加。其中，增加改變的幅度以解除戒嚴前夕的三年為最，解嚴後的三年中，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雖有增強，但改變的幅度並不很大。甚至在民國78年施測時，具有制衡權正當信念的選民人數百分比，有降低的現象。例如，選民對「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這樣一道測量制衡權題目的回答中，78年時同意的比率為48%，比75年的56%少八個百分點，但仍比解嚴前的40%多八個百分點。選民中具有制衡權正當信念的人數比率，不但增加不多反而有減少的發現，正可以說明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的政治轉型現象：由於民國75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甫成立的民進黨能以獲得22%強的選票當選十二席立委，民進黨與國民黨抗爭的戰場也轉到立法院，尤以逼退終身職立法委員、質詢政府首長與癱瘓立法議程等，來凸顯民進黨抗爭一黨威權體制的不合理；然而，選民在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影響下，很可能就會聯想制衡權的負面效果，而同意「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⁵

表二：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民國72年至78年

	72年 (A) %	75年 (B) %	78年 (C) %	(B-A) %	(C-B) %	改變 總計 %
自由權						
(1)大家的思想如不一致，社會就會紛亂。	24	37	43	+13	+6	+19
(2)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44	62	62	+18	+0	+18
多元權						
(3)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雜亂紛擾，影響到地方的秩序與和諧。	26	40	45	+14	+5	+19
(4)一個國家如果政黨太多，會導致政治混亂。	25	36	40	+11	+4	+15
制衡權						
(5)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	40	56	48	+16	-8	+8
(6)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重大的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54	67	67	+13	+0	+13

註：表中數值為有效樣本中，具有「民主價值取向」（即回答不同意者）人數的百分比。

整體而言，解除戒嚴以前選民中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人數比率較低，但在解嚴前夕卻有大量的增加。解嚴以後，選民中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人數比率，亦有增加，但幅度卻相對變小，其中，尤以選民是否具有制衡權的取向，與解嚴前夕來比較，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這或可能受到解嚴後政黨抗爭引起的立法院議事效率低落與公權力行使品質的惡化所造成，所以，在78年時認為「行政」與「立法」的權力應相互制衡的選民，比較75年而言，比率要減少許多。從上述測量選民是否具有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的題目來看，在戒嚴時期的72年間，只有四分之一的選民認為意見不一致與社會紛亂無關、社會團體與政黨的多寡，不能等同於社會秩序與政治安定的好壞，然而在政府宣布解嚴前夕，抱持著言論自由權與多元權的選民，人數已接近四成左右。這種強調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的選民比率增加，不但為政府宣布解除戒嚴的政令鋪陳了民意基礎，同時也可能增強甫新成立的民進黨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挑戰。

2. 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

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政府的宣布解除戒嚴是一個非常重要分界點。解嚴前民主政治的實施，可說是威權統治下的訓政民主 (tutelary democracy)：雖有民主制度設計但公民政治權利的行使卻有限制，如中央民意代表無法全面改選、黨禁與言論自由權的限制等。戒嚴解除與黨禁開放，臺灣的政治才進入一個政黨競爭的民主化過程。在這民主轉型期之中，由上面關於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我們可以發現愈來愈多的選民具有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的正當信念。如果上述的民主價值取向落實到競爭性政黨政治的範疇來看時，亦即本文所稱的「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情況又如何？當解嚴之後，各種政治抗爭、自力救濟與社會運動興起，社會治安與犯罪等重大問題逐漸浮現之際，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展望又如何？換言之，上述所說民主價值取向的增強改變是一種趨勢？抑或僅是一種民眾在解嚴前求變的暫時性變化，不具有穩定而持續的特性，而隨著政治環境改變而發生的變化？

表三：選民的民主政黨價值取向，民國80年

	百分比
(1) 有強有力的反對黨，政治才會進步。(+)	82
(2) 一般說來，政黨競爭會破壞政治的安定。(-)	60
(3) 參加反對黨的人，他們的愛國情操是值得懷疑的。(-)	77
(4)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夠民主了，實在不該再奢求什麼。(-)	58
(5) 如果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做得不好，就應該換別人來做。(+)	64
(6) 從解除戒嚴後的變化來看，臺灣實在不適合實行民主。(-)	85

註：表中數值為回答有效樣本中，具有「民主政黨價值取向」

(即正面題目回答「同意」，而負面題目回答「不同意」

者)人數的百分比。

本文所稱「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主要是指競爭性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必然性等兩種內涵的正當信念而言。這乃是延伸上述的民主價值取向，而落實在戒嚴後的時空來加以觀察的測量。就民主化轉型乃是解嚴後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言，如表三的資料所示，有58%的選民，不同意臺灣已經夠民主了，不該再奢求什麼；同時，甚至高達85%比率的選民大眾，不同意解嚴後政治社會紛亂就表示臺灣不適合於實行民主。由此可見，解嚴後兩黨政治抗爭的激烈化與升高，並沒有改變選民對民主政治必然性的預期與看法。從多元權關於政黨競爭的角度來看，表三的數據顯示，在民國80年底受測時，選民中有82%的人同意有強有力的反對黨，政治才會進步；而不同意政黨競爭會破壞政治安定的選民，占60%左右。同樣地，有77%的選民不認為參加反對黨的人在愛國情操上是值得懷疑的；認為國民黨做得不好就應該換別人來做的選民，比率達64%之多。這些發現指出：選民在解除戒嚴與黨禁開放後，不但認為國民黨做不好可以下臺，反對黨只是一個競爭的政黨，同時也

肯定反對黨的政治角色和政黨競爭的政治功能。換言之，選民不但認為民主政治是必然的政治發展趨向，同時也相當程度地認同民主政治中政黨競爭的價值。雖然表三所列的這些測量「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題目，與表二的「民主價值取向」的測量題目不一樣，但我們不難發現兩者的相近性。若與表二中具有多元權與制衡權正當信念的選民人數比較，則很顯然的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選民具有多元權與制衡權取向的比率，在民國80年施測時有增無減，並不會受到解嚴後轉型期政治紛亂影響而減低。

3. 民主價值取向的性質

上述的分析指出，就整體的選民而言，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人數比率，從解嚴前到解嚴後的72年至78年之間，呈現出一種向上急遽爬升(解嚴前夕)而趨於緩和(解嚴以後)的改變趨勢。這種從個體層次上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趨勢，可以來對照並了解總體層次上政治民主化的轉型發展過程，雖然在經驗上我們很難去施測與驗證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兩者之間變遷的因果關係，但我們卻也很難在經驗上去否證兩者之間的變化不具有影響的關係。我們透過這樣的對比觀察，旨在於說明：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社會中，總體層次的政治變遷與個體層次的個人政治態度與價值改變之間，必然存在著相合與同步發展的關聯性。然而，就個體層次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民主政黨價值取向而言，是否也具有內部的單一面向關係？換言之，選民在自由權的取向上增強的同時，是否也具有更強烈的多元權與制衡權的正當信念？從統計分析的角度來說，即這些構成為操作性定義民主價值取向量表的個別測量問題，是否具有高度的相關關係？

首先，就表四因素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民主價值取向的測量題目，無論是在民國72年、75年或78年施測，題目之間的內部的相關性都很高，可以由統計上的因素分析而抽繹出一個共通的因素結構。換言之，無論是自由權、多元權或制衡權，都具有高度的相關關係，而構成為一個所謂「民主價值取向」的因素。從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正當信念成為一個因素的發現，我們可以推定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必然是一整體的，這可由

表二的變化情形得到一些佐證。由於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是一套具有相互關聯的價值體系，而這種具有結構的民主價值體系之改變，必然也會影響其他相關態度與行動的改變。對外在政治環境而言，選民整體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結果，也就會構成促發與推動政治民主化的變革。

其次，從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來看，表五的因素分析結果也顯示：選民對競爭性政黨政治、在野黨的角色與功能、及對解嚴後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之間，都具有共通且一致的看法。這些一致性看法背後的共通因素，姑且以「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來命名。表五中所列的測量題目，都呈現出高度單一面向的關係而可抽繹出一個共通的因素。這發現不但指出民主政黨價值取向的測量題目，頗具有內在一致的信度，同時也說明在選民心中，競爭性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實施，乃是具有密切關係而不可分的一體兩面。這層發現，也可以說明：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就選民看來，已經逐漸變成一種必然政治發展趨勢；選民不僅認為反對黨會有助於政治進步，同時也逐漸接受政黨輪流執政與競爭性政黨政治時代的來臨。

表四：民主價值取向的因素分析，民國72年至78年

測量題目	因素負荷量		
	72年	75年	78年
(1)大家的思想如不一致，社會就會紛亂。	.670	.692	.648
(2)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581	.620	.593
(3)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雜亂紛擾，影響到地方的秩序與和諧。	.726	.788	.732
(4)一個國家如果政黨太多，會導致政治混亂。	.721	.756	.764
(5)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	.626	.639	.632
(6)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重大的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533	.488	.441
固有值	2.51	2.70	2.49
解釋變異量百分比	41.8	45.0	41.4

表五：民主政黨價值取向的因素分析，民國80年

測量問題	因素負荷量
(1) 有強有力的反對黨，政治才會進步。	.570
(2) 一般說來，政黨競爭會破壞政治的安定。	.641
(3) 參加反對黨的人，他們的愛國情操是值得懷疑的。	.698
(4)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夠民主了，實在不該再奢求什麼。	.671
(5) 如果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做得不好，就應該換別人來做。	.401
(6) 從解除戒嚴後的變化來看，臺灣實在不適合實行民主。	.593
固有值	2.18
解釋變異量百分比	36.4

六、選民政黨偏好的改變與持續性的政黨重組

由上面表一民國69年至80年之間、歷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政黨總得票率變化來看，我們指出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政治中勢力的消長趨勢，乃是一種持續性的政黨重組現象。這種漸進與持續的政黨重組，與臺灣的政治從戒嚴而至於解嚴的民主轉型過程，具有密切的相互影響關係。假定臺灣的民主轉型，就如同 Adam Przeworski (1986: 60) 所指出的：「一個和平的民主轉型之成為可能，首要解決的問題，即在如何將轉型的不確定加以制度化，而其結果不會威脅到具有能力扭轉這種轉型過程者的利益。」⁶ 的確，臺灣的定期選舉就是這種規範競爭性政治過程的制度，而解嚴前後的選舉競爭之結果，並沒有給國民黨與民進黨雙方的政治利益，帶來極為不利的威脅。解嚴前後歷次選舉中，國民黨持續流失選票與民進黨逐漸贏得選民支持的政黨重組情形，雖給國民黨帶來選舉競爭的壓力，但還不足以影響國民黨執政地位的利益。因此，在選舉制度的連帶安排之下，國民黨為補救因終身職中央民意凋零所必然發生之地域代表性的法統危機，必須讓選舉仍然繼續下去，以取得統治的合法性基礎。雖然在75年9月底民進黨宣布組成，直接地向戒嚴與黨禁挑戰，但蔣經國所領導的國民黨，卻能毅然地在76年7月中達成妥協而宣布解除戒嚴令，而開啟了臺灣政治民主化的大門。

選舉過程中政黨重組的現象，固然可以從總體選舉結果的政黨得票率與政黨勢力的消長來發現，但進一步分析政黨重組的過程，則必須依賴個體層次上選民對政黨心理依附感之政黨認同變化來觀察。如以上指出的，密西根大學選舉研究所發展與測量的政黨認同，在欠缺政黨政治傳統的臺灣儒家社會，很難找發展同樣而且有效度的測量。但若以政黨認同概念所指選民對政黨的心理依附感而言，則在臺灣的政治環境中，我們以政黨偏好的感情面來測量政黨認同，所測得的內涵大體上仍然可以反應選民對政黨的主觀心理取向（雷飛龍、陳義彥等人，1987，1991；徐火炎，1991）。當然，關於政黨認同的測量，仍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去探討。以下的討論，我們就從政黨偏好改變的角度，來看解嚴前後政黨的重組過程。

表六：選民的政黨偏好，民國72年至80年

	72年	75年	78年	80年
	%	%	%	%
國民黨	38.4	44.6	38.5	47.3
其他*	54.6	47.2	48.9	40.6
(黨外) / 民進黨	(7.0)	8.2	12.6	12.1
有效樣本數(N)	1647	1359	1301	1618

註：表中數值有效樣本的百分比。

*：「其他」一類包括「沒有偏好」、「不知道」與
「無所謂喜不喜歡」等。

以表六選民政黨偏好的變化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四點發現來加以說明。首先、由民國72年至80年之間的三次增額立委與第二屆國代選舉的調查中，選民政黨偏好的分佈，雖有變化但變化的幅度不大；一方面這發現指出選民政黨偏好的穩定性與有效的測量，另一方面顯示出選民政黨偏好的改變是一種緩慢的過程，而選民政黨偏好的改變也是一種持續性的政黨重組

過程。第二、在解嚴前夕的75年增額立委選舉、及在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後的第二屆國代選舉時，對國民黨具有偏好的選民比率為最高，而在72年與78年的選舉時為最低；這可以說明國民黨所作的前瞻性與改革性的政府重大決策，例如：民國75年增額立委選舉前對民進黨的容讓、76年的宣布解除戒嚴、以及80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等決定，往往會贏得選民的向心力；但在72年與78年選舉前後、政府的決策搖擺不定與公權力不彰，也是國民黨所必須背負的包袱，選民因此對國民黨的偏好程度也隨之減少。第三、民進黨從72年的「黨外」前身到宣布組黨後的兩次選舉中，已經逐漸獲得選民對它的偏好，然而自解嚴後的78年至80年選舉之間，對民進黨具有偏好選民的比率卻沒有增加，這可能與民進黨近年來的整體表現不佳有關。

最後，從表六中「其他」類別的、沒有政黨偏好或回答不知道的選民比率改變來看，解嚴前後的政黨勢力的消長，並不是所謂的一種「政黨解組」的改變過程。換言之，這種改變並不是選民變得愈來愈不具有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若以不具政黨偏好選民比率從最高的72年逐漸降到最低的80年來看，這種趨勢反而在於說明兩種現象：一是政黨競爭隨著解嚴與黨禁的開放而升高，造成愈來愈多的選民具有黨派性(partisanship)，但不具政黨偏好的選民比率仍然很高；二是偏好國民黨的選民減少，與偏好民進黨的選民增加之間，所呈現的並不是「零和的賽局」而是「非零和的賽局」的競爭，亦即中間不具政黨偏好的選民增加或減少對兩黨的偏好，所以導致民進黨或國民黨偏好者比率的增減；這種改變，並不是選民從偏好一個政黨轉變到偏好另一個政黨的改變。這項發現也說明：將來兩黨選舉競爭的主要戰場，可能是如何去動員人數衆多的不具政黨偏好的選民。

假定一個加入國民黨成為黨員的選民，也一定會在感情上偏好國民黨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從表七國民黨員與偏好國民黨選民的比較中，來觀察選民對國民黨偏好的變化。首先，表七的調查結果顯示，除了民國72年選舉時，國民黨員比率較高外，選民中的國民黨員大約占有20%左右。的確，由於國民黨具有悠久的歷史，同時歷經三十多年一黨獨占式的統治，在「愛黨即愛

國」的統治下，選民中具有國民黨黨員身份的比率，約占 20% 並不足為奇。但國民黨的黨員比率，自解嚴後並沒有增加，或許可以說明：民衆加入國民黨本身，已非如同解嚴前一樣，是一種參政的必要捷徑。然而，將偏好國民黨的選民扣除掉國民黨黨員的比率，則可發現非國民黨的選民在 75 年與 80 年兩次的選舉中，有較高比率的選民表示偏好國民黨，而與民進黨偏好者的比率來比較，結果也是相同。所以，這個發現也佐證了上面所說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勢力消長，主要在於非國民黨黨員的中間游離選民。

表七：選民中國民黨員及偏好國民黨者的比較

	72年 %	75年 %	78年 %	80年 %
(1) 國民黨員	24.3	9.4	20.8	19.5
(2) 偏好國民黨者	38.4	44.6	8.5	47.3
(3) [(2) 減(1) 的] 差距	14.1	25.2	17.7	27.8
(4) 與黨外、民進黨比較	+7.1	+17.0	+ 5.1	+18.7
有效樣本數(N)	1695	1430	1301	1604

從選民政黨偏好的變化中，我們一方面觀察到解嚴前後的政黨重組過程，主要不是歐美社會所發生的一種由政黨解組而導致的重組過程，而是一種由純粹的不具政黨偏好的選民，逐漸地變成具有黨派性的政黨組合(party alignment) 現象。另方面，我們也發現解嚴前後的政黨重組過程，不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零和賽局」。換言之，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舉勢力消長，主要戰場可能還是在於中立而不具政黨偏好的選民。這些中立不具政黨偏好的選民，自解除戒嚴以來，已經逐漸被政治化而具有黨派性的發展趨勢；這或許可以看成是，臺灣的選民已經逐漸地愈來愈具有政黨政治與政黨競爭的觀念，而傾向於表達對政黨的感情上喜好。

七、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的影響因素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指出選舉與選舉過程中政黨勢力的消長，在推動臺灣的民主化方面，扮演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角色。我們也認為要了解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不能忽略對個體層次上環繞著選舉與政黨競爭之個人的態度、價值及行為等變化的探討。在經濟逐漸富裕、社會普遍現代化的情況下，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投票行為之改變，不僅推動與促發了臺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同時也會受到解除戒嚴後政治環境的影響而進一步改變。上面我們已經指出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的改變情形，並將這些個體層次的改變與整體層次上選舉結果中政黨得票分配的變化加以比較，來觀察臺灣解嚴前後的政黨重組現象。以下，我們進一步分析造成政黨得票比率變化、政黨勢力消長等政黨重組結果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究竟受到那些因素所影響？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對黨派投票行為又具有怎樣的決定作用？

首先，從表八中我們可以知道選民樣本的黨派投票分配，這也是以下所要分析與討論的依變項。與上面表一總體的選舉結果之政黨得票比率比較來看，雖然選民樣本中投國民黨票的比率稍微偏高，而投民進黨與其他黨派的比率偏低一些，但這種誤差乃是於抽樣調查所造成的。從比較表一與表八關於黨派投票的比率中，可以發現這些誤差並不大，因此我們可以相信調查訪問的選民樣本，對於黨派投票的資料，具有高度的效度。

表八：受訪樣本的選民黨派投票

	72年		75年		78年		80年	
	N	%	N	%	N	%	N	%
國民黨	874	79.7	756	73.4	627	71.9	807	71.5
其他黨或無黨籍	40	3.6	73	7.1	54	6.2	89	7.9
(黨外) / 民進黨	(183	16.7)	201	19.5	191	21.9	232	20.6
有效樣本數	1097		1030		872		1128	

其次，我們參考選擇以往有關選舉研究中、常被選用而且也發現具有影響作用的個人與社會屬性變項，如性別、年齡、省籍、教育程度與黨籍等，來作為我們分析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的自變項。在分析的策略上，為了考慮到研究變項的測量屬性，本文採取兩種作法：首先，為了比較選民的個人與社會屬性等自變項、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中介變項等相互之間的相對影響效果，我們採取統計上的迴歸分析來達到這個目的；由於分析的目的在於比較解釋變項對被解釋變項的作用大小，為了消除不同變項間測量單位不同所引起的不能比較的問題，我們選擇以標準化的迴歸係數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通稱為 β 係數) 來報導。其次，由於本文所分析的依變項是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而選民的黨派投票乃是一種所謂「兩分的或多分的屬質性」變項 (dichotomous or polytomous qualitative variable)；這種以有限變量為依變項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的統計分析，違反一般最小平方法線性迴歸分析關於依變項的基本假定；換言之，一般最小平方法線性迴歸分析的依變項，必須是連續性的、以及誤差項的變異量相等且具常態分佈等特性的假定。(Aldrich and Nelson, 1984; Maddala, 1983)因此，在探討影響選民黨派投票的因素上，本文嘗試採用「多重洛基」 (multinomial or polytomous logit model) 的分析模型來處理，以符合被解釋變項的屬質性特質。⁷

1. 影響民主價值取向與民主政黨價值取向的因素

民主價值取向在本文的操作性界定之下，主要是指選民是否具有一個理想的民主政治社會所應當有的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的一種信念。在上面的討論中，可以發現臺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已經在增強的改變趨勢之中，而改變的幅度以政府宣布解除戒嚴的前夕為最大，以後的增強改變趨於緩和。其中，選民對制衡權的信念，甚至受到了時局的影響，而有所保留與遲疑，但比較解嚴前後的趨勢來看，選民對制衡權的正當信念，仍然是增強的改變。同時，由上述因素分析的結果所顯示，不論自由權、多元權或制衡權，都具有單一面向的關係而構成為一個因素，這個共通的因素就是本文

表九：影響選民民主價值或民主政黨價值取向的因素

預測變項	依變項：民主價值取向（高）			
	民主政黨價值取向（高）			
	72年	75年	78年	80年
性別(男)	.110***	.122***	.158***	.183***
省籍(本省)	.144***	.013	.034	.102***
年齡(大)	-.037	.040	-.008	-.112***
教育程度(高)	.239***	.307***	.334***	.272***
黨籍(國民黨)	-.086*	-.125***	-.091*	-.043
R square	.087	.095	.129	.151
有效樣本數	1051	969	768	1114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說明：(1)表中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2)性別、省籍及黨籍為虛擬變數。

所稱的民主價值取向。以下，我們進一步分析，究竟那些個人與社會屬性的因素會影響選民民主價值取向。

以表九的迴歸分析結果而言，選民的性別、教育程度與黨籍等變項，一直都是影響民主價值取向的顯著因素。換言之，無論是以解嚴前的72年或75年，還是從解嚴後的78年來看，男性的、教育程度比較高以及非國民黨員的選民，很顯然地都是具有比較強的民主價值取向；其中，尤以教育程度的影響作用為最大，其次才是性別的因素。就民國72年的調查來說，選民的省籍不同也是預測民主價值取向的顯著變項；若在其他條件都相似的情況下，本省籍的選民比外省籍的選民，顯著地具有較強烈的民主價值取向。對於為什麼

麼有些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高或低差別的原因，從性別、教育程度與是否國民黨員或省籍等條件的不同，大致上可以解釋9%至13%左右。當然，這點也是在於說明：預測選民價值取向的顯著因素，或許還有許多不在本研究的考慮範圍內，希望未來的研究可以在這基礎上繼續努力。

在民國80年國代選舉的研究中，我們以「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的量表，來測量選民是否接受民主政治運行所需的政黨競爭與政黨輪替執政的價值觀念，以及是否具有實踐民主政治的信念。這些測量題透過因素分析，如上述表五所示，可以抽繹出一個共通的因素結構，我們即稱這些測得的共通信念為「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從表九的迴歸分析結果中，我們發現選民的性別、省籍、年齡與教育程度等變項，對民主政黨價值取向的高低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作用。男性的選民、本省籍的、年紀比較輕的與教育程度比較高的選民，顯然地具有較高的或較強烈的民主政黨價值取向。選民的性別、省籍、年齡與教育程度等不同，總共可解釋選民在民主政黨價值取向所以具有高低變異量的15%左右。其中，以教育程度的影響作用最大，其次是選民的性別，再次才是選民的年齡差異。

2. 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因素

我們以選民對政黨「喜歡（偏愛、傾向）——不喜歡（偏愛、傾向）」的程度，來測量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一種情感反應。這種對政黨喜不喜歡的情感態度，在美國的選舉研究中，也常被用來輔助測量選民的政黨認同。（Wattenberg, 1981）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表示喜歡或不喜歡的這種情感態度，基本上呈現出一致，即偏愛民進黨的選民傾向於表示不喜歡國民黨；因此，政黨偏好的測量頗能符合傳統密西根政黨認同量表所欲測量的政黨之「敵對性」（徐火炎，1991）。上述中我們以選民政黨偏好的變化來看政黨的重組，同時也指出解嚴前後的政黨重組過程，乃是中立的選民逐漸對民進黨或國民黨表示偏愛的一種改變。我們也假定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會影響他們對政黨的偏愛或喜歡程度。換言之，即假設民主價值取向較強烈或比較接受政黨競爭與政黨輪替執政的選民，比較可能

表十：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因素

預測變項	依變項：政黨偏好（黨外 / 民進黨）			
	72年	75年	78年	80年
性別（男）	.067*	.032	.036	.022
省籍（本省）	.142***	.186***	.184***	.137***
年齡（大）	-.152***	-.044	-.012	-.066*
教育程度（高）	-.153***	-.167***	-.085*	-.208***
黨籍（國民黨）	-.343***	-.222***	-.223***	-.179***
民主價值取向（高）	.105***	.271***	.256***	—
民主政黨價值取向（高）	—	—	—	.361***
R square	.270	.218	.180	.217
有效樣本數	1051	969	768	1114

* : $p < .05$ **: $p < .01$ ***: $p < .001$

說明：(1)表中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2)性別、省籍及黨籍為虛擬變數。

會表示偏好民進黨，期待民進黨壯大以制衡國民黨。

由表十的分析結果中，我們發現從民國72年至80年之間，選民的省籍、教育程度、黨籍與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等，對於政黨偏好都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易言之，本省籍的、非國民黨員、教育程度較低的、及民主價值或民主政黨價值取向較強烈的選民，顯著地傾向於偏愛民進黨。這些個人背景變項與民主價值取向，大致上可以解釋選民在政黨偏好所以不同的18%至27%左右的變異量。如表十的結果所示，選民的性別差異，僅在

72年的調查中，才對政黨偏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作用，同樣地也只在72年與80年的兩次調查資料中，選民年紀的不同才對政黨偏好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這點發現可以說明，與其他的影響因素比較而言，選民的性別與年紀等個人背景因素，對政黨偏好的差異愈來愈沒有決定的作用。從比較不同時間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解釋變項之變化，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就解除戒嚴前的民國72年調查資料而言，是否為國民黨員的黨籍變項，乃是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最主要因素，但隨著解嚴與黨禁的開放，黨籍的影響作用則逐漸變小；代之而起的是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及80年調查時所稱的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在解嚴以後變成為決定選民政黨偏好最主要的一項因素。

上述分析中指出，解嚴前後所發生的持續性政黨重組過程，可以從選民政黨偏好的改變來觀察，同時，我們也發現這種政黨重組的現象，乃是中立的選民逐漸對民進黨或國民黨表示偏愛的一種改變。從「黨籍」一直都是決定選民政黨偏好不同的顯著因素而言，正可以印證這個發現。換言之，加入國民黨成為黨員的選民，比較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政黨偏好；而改變政黨偏好的選民，多來自於非國民黨員的選民羣體。從省籍、教育程度與民主價值取向等變項，對選民的政黨偏好具有顯著影響作用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非國民黨員的選民，若是本省籍的、教育程度較低的話，在具有比較強烈民主價值取向的條件下，則比較可能從中立的政黨偏好，改變成對民進黨具有偏好的選民。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愈來愈成為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主要決定因素，則在於指出解嚴以後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分歧與重組的誘因，愈來愈建立在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上，而這種發展也顯示臺灣政治民主化與政黨競爭的趨勢。

3. 影響選民黨派投票的因素

政黨重組的現象，主要是建立在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集體選舉結果之上。唯有透過對政黨候選人投票支持的行為，選民的政黨偏好（或政黨認同）的心理感情，才能具體化作用於政黨勢力的消長。選民大眾的民意趨向，固然構成為統治精英決策在取捨政治轉型方向的潛在影響力，選民投票的集體

行為結果才是促發與推動統治精英決定民主轉型的具體力量。影響選民黨派投票的因素或許有很多，但本研究的分析僅止於探討與比較選民的個人與社會屬性的變項、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因素，對黨派投票的影響。從表十一、十二、十三與表十四中的虛擬化解釋總變異量百分比值(pseudo R-square)來看，⁸我們可以發現，包含選民的個人與社會屬性的變項、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因素在內的解釋模型，對選民黨派投票變異的解釋力，除了對民國72年的增額立委選舉的黨派投票，僅能解釋17.6%左右的變異量而稍微偏低之外，對民國75年與78年兩屆增額立委選舉、及80年的第二屆國代選舉等，都能具有26%左右的解釋力，可見這些解釋變項，對於了解選民黨派投票而言，具有很重要的貢獻。以這些解釋變項，來預測或分類選民在72年至80年的各次選舉的黨派投票，正確的比率，從表十二至表十四的分析結果中可知，亦皆達82%以上。

從表十一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民國72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中，選民的省籍、國民黨黨員身份、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變項，是影響選民投票給當時「黨外」候選人的顯著性因素；同時，省籍、國民黨黨員身分與民主價值等，也是決定選民是否投票給無黨籍候選人的顯著影響因素。進一步從洛基迴歸分析模型中，解釋變項的導數值(independent variable derivatives)來看，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本省籍的選民比外省籍的選民可能投票支持「黨外」候選人的機率達10%左右，投給無黨籍候選人的機率則因省籍的不同而相差3.3%。同樣地，一個國民黨的黨員與非黨員的選民比較，可能投給「黨外」候選人的機率則減少7%左右，但投給無黨籍候選人的機率，卻增加3%左右。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對黨派投票的顯著影響效果，可以從民主價值取向高低兩個極端的對比來看：一個強烈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得分達正十八分者)，與一個強烈不具有此種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得分為負十八分)來比較，投票給「黨外」的相對機率就增加為16.2% ($36 \times .0045 = .162$)，兩者投給無黨籍候選人的可能機率就相差為百分之六點四左

表十一：影響選民（72年）黨派投票的洛基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t）

解釋變項	量化方式	被解釋變項			
		黨外	導數值	B	導數值
性別（男）	（虛擬）	.1723 (.1947)	.0154	-.6478 (.3554)	-.0212
省籍（本省）	（虛擬）	1.3332** (.4891)	.1017	1.1499* (.5719)	.0330
年齡（大）	（20至65以上）	-.0110 (.0091)	-.0009	-.0044 (.0155)	-.0001
教育程度（高）	（1 至 20）	-.0037 (.0301)	-.0004	.0419 (.0525)	.0014
黨籍（國民黨）	（虛擬）	-.8871* (.3496)	-.0723	.8852* (.4129)	.0308
民主價值取向（高）	（-18至+18）	.0594*** (.0139)	.0045	.0651** (.0234)	.0019
政黨偏好（民進黨）	（1 至 7）	.8117*** (.0978)	.0632	.2377 (.1515)	.0053
常數項		-5.2056*** (.9011)	-.3958	-4.8958*** (1.3073)	-.1417
有效樣本數				1051	
-2LLR (Model Chi-Square)				225.0427	
DF				14	
Pseudo R-Square				.176	
% Correctly Predicted				85.73	

*: p<.05 **: p<.01 ***: p<.001

說明：(1) 本表以「投國民黨票」為分析模型的比較根據。

(2) B 值係 Log odds 係數的估計值，括弧中數值為標準誤的數值。

(3) 導數值乃是解釋（自）變項每一單位變化，對選擇被解釋（依）變項增加（正號）或減少（負號）的淨機率值。（Steinberg, 1985: 9）以省籍變項為例，在其他的變項都加以（統計上的）控制的情形下，本省籍選民在民國72年立委選舉投給「黨外」候選人的可能機率為10.17%，投給無黨籍候選人的可能機率為3.3%，而不可能投給國民黨的機率則為13.47%。因為，在 Multinomial Logit 的分析模型中，投給國民黨的機率變化值加上投給「黨外」的機率變化值，再加上投給無黨籍的機率變化值，總合必須等於零。

(4) 「量化方式」一欄指出變項的測量性質，同時也指出連續變項量化計分的數值範圍。

表十二：影響選民（75年）黨派投票的洛基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t）

解釋變項	量化方式	被解釋變項			
		民進黨		無黨籍	
	B	導數值	B	導數值	
性別（男）	（虛擬）	.3217 (.2176)	.0288	.0915 (.2743)	.0036
省籍（本省）	（虛擬）	1.1576** (.4623)	.0995	.9376 (.6231)	.0511
年齡（大）	（20至65以上）	-.0110 (.0095)	-.0008	-.0343** (.0132)	-.0021
教育程度（高）	（1 至20）	.0423 (.0322)	.0048	-.1413*** (.0450)	-.0092
黨籍（國民黨）	（虛擬）	-1.1014*** (.3477)	-.0969	-.5630 (.4492)	-.0279
民主價值取向（高）	（-18至+18）	.0861*** (.0136)	.0076	.0360* (.0176)	.0017
政黨偏好（民進黨）	（1 至 7）	.9410*** (.0898)	.0849	.1791 (.1181)	.0048
常數項		-6.0771*** (.8307)	-.5477	-1.2200 (1.0704)	-.0350
有效樣本數				969	
-2LLR (Model Chi-Square)				354.4880	
DF				14	
Pseudo R-square				.268	
% correctly predicted				86.17	

*: p<.05 **: p<.01 ***: p<.001

說明：請參見表十一的說明。

右。同樣地，我們可以從一個對「黨外」準政黨組織具有強烈偏好的選民（得七分），來估計他可能因此而增加44.2%左右($7 \times .0632 = .4424$)的機率去投黨外候選人的票。

表十三：影響選民（78年）黨派投票的洛基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t）

解釋變項	量化方式	被解釋變項			
		民進黨	導數值	無黨籍	導數值
性別（男）	（虛擬）	.4032 (.2188)	.0445	.2132 (.3539)	.0078
省籍（本省）	（虛擬）	1.4483** (.4681)	.1705	-.8311* (.3998)	-.0508
年齡（大）	（20至65以上）	-.0087 (.0094)	-.0008	-.0306 (.0160)	-.0015
教育程度（高）	（1 至20）	-.0032 (.0535)	-.0003	-.0131 (.0847)	-.0006
黨籍（國民黨）	（虛擬）	-1.2143*** (.3440)	-.1308	-1.0903* (.4955)	-.0455
民主價值取向（高）	（-18至+18）	.0439** (.0148)	.0048	.0331 (.0234)	.0013
政黨偏好（民進黨）	（1 至 7）	.8222*** (.0913)	.0922	.2102 (.1242)	.0048
常數項		-5.1980*** (.8080)	-.5822	-1.3898 (1.0296)	-.0330
有效樣本數				769	
-2LLR (Model chi-Square)				261.1809	
DF				14	
Pseudo R-Square				.254	
% correctly predicted				82.44	

*: p<.05 **: p<.01 ***: p<.001

說明：請參見表十一的說明。

上述的洛基迴歸分析模型中，我們透過解釋變項的導數值，可以簡潔而清楚地了解選民的個人與社會屬性變項對黨派投票選擇機率的影響作用。以下為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們不擬重複說明這種影響效果及選擇的機率計算，

表十四：影響選民（80年）黨派投票的洛基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t）

解釋變項	量化方式	被解釋變項			
		民進黨		無黨籍 / 社民黨	
B	導數值	B	導數值		
性別（男）	（虛擬）	-.0114 (.1976)	-.0049 (.2456)	.4337	.0312
省籍（本省）	（虛擬）	.8324* (.3910)	.0783 (.4254)	.4516	.0252
年齡（大）	（20至65以上）	.0131 (.0101)	.0015 (.0131)	-.0202	-.0016
教育程度（高）	（1 至20）	-.0425 (.0682)	-.0034 (.0890)	-.0950	-.0064
黨籍（國民黨）	（虛擬）	-.9782** (.2891)	-.0843 (.4223)	-1.4167** (.0398)	-.0932
民主政黨價值取向（高）	（-18至+18）	.2109*** (.0330)	.0197 (.0398)	.1298** (.0398)	.0075
政黨偏好（民進黨）	（1 至 7）	.9443*** (.0881)	.0902 (.0910)	.3543** (.0910)	.0173
常數項		-6.1288*** (.8119)	-.5814 (.9532)	-2.7410**	-.1437
有效樣本數				1114	
-2LLR (Model Chi-Square)				401.1839	
DF				14	
Pseudo R-Square				.265	
% correctly predicted				81.96	

*: p<.05 **: p<.01 ***: p<.001

說明：請參見表十一的說明。

只指出具有顯著影響作用的解釋變數。從表十二中，選民的省籍、是否具國民黨黨員身份、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因素，是影響選民在民國75增額立委選舉投票時，是否投票給民進黨的顯著變項。一個本省籍的選民、沒有

參加國民黨、具有強烈的民主價值取向、以及心理上較偏好民進黨，則顯著地傾向於投民進黨候選人的票，機率達83%左右。⁹影響選民傾向於投票給無黨籍候選人的因素，則為候選人的年紀、教育程度與民主價值取向；換言之，年紀愈輕的、教育程度較低的、以及較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投票選擇無黨籍候選人的可能機率也就顯著地較大。

就以選民在民國78年增額立委選舉的黨派投票而言，從表十三的分析結果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選民的省籍、是否具國民黨黨員身份、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因素，仍然是解釋選民投民進黨或國民黨候選人一票的顯著變項：本省籍的、非國民黨員的、民主價值取向高的、及傾向於偏好民進黨的選民，選擇投給民進黨候選人，比投給投國民黨候選人的機率顯著為高，反之亦然。然而，選擇投給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與投給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民比較而言，則以非國民黨員的與外省籍的選民，機率才顯著比較大。

以民國80年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而言，從表十四的洛基迴歸分析結果中，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選民的省籍、是否具國民黨黨員身份、民主政黨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等個人與社會屬性的差異，是顯著影響選民投民進黨或國民黨候選人一票的變項。換言之，本省籍的、非國民黨員的、民主政黨價值取向高的、及傾向於偏好民進黨的選民，選擇投給民進黨候選人的可能機率顯著為高，反之亦然。投票支持無黨籍或社民黨的選民之中，則以顯然非國民黨員的、民主取向較高的、及比較不喜歡國民黨的選民機率比較大。

從上面表十一至表十四的洛基迴歸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歸結幾點研究發現於下：第一、選民的省籍差異、是否加入國民黨、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價值取向、以及政黨偏好等因素，乃是解嚴前後歷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決定選民投票給國民黨或民進黨候選人的顯著預測（解釋）變項。

其次、影響選民傾向投票給無黨籍或其他黨候選人的因素，或許由於樣本數較少之故，也可能因為無黨籍或其他黨候選人所代表的，乃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個比較組織化政黨之外的可能「殘遺項」(residual category)，在不

同的選舉中投票給無黨籍或其他黨候選人的選民羣體之間，並沒有跨越不同選舉而存在的共通因素可尋。因此，若與投國民黨的選民來比較，在72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中，本省籍的、國民黨員的與民主價值取向較高的選民，較可能投票支持黨外或其他黨候選人。在75年的增額立委選舉時，無黨籍或其他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則以年紀較輕的、教育程度較低的、與民主取向較高的選民較為可能。投無黨籍或其他黨候選人的選民，以民國78年的選舉而言，則以外省籍的與非國民黨黨員的選民較為可能。至於在民國80年的國大代表選舉，卻以非國民黨黨員的、民主政黨價值取向較高、且較不偏好國民黨的選民，較可能投票支持無黨籍或民社黨的候選人。

第三、從顯著影響選民投國民黨或民進黨的解釋變項之導數值(即解釋變項每單位變化而產生對依變項做選擇的可能機率變化值)的變化來看，我們不難可以發現：(1)省籍與是否為國民黨黨員的影響作用，除了在民國78年的立委選舉比較凸顯外，到了80年的國代選舉，反而有下降的現象；(2)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價值的影響，除了在民國78年選舉變弱之外，有一直增強的趨勢；(3)至於政黨偏好對選民選擇國民黨或民進黨可能機率的影響，從民國72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以來，呈現逐漸加強的趨勢。

總之，在解嚴前後歷次選舉中，選民的省籍、是否具國民黨黨員身份、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及政黨偏好等差異，一直都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時選擇投國民黨或民進黨的主要因素。這項發現可以說明：第一、選民的省籍差異仍然是解嚴前後政黨重組的基線之一；換言之，投票支持民進黨的選民絕大多數是來自本省籍的選民羣體，而外省籍的選民多傾向於投票支持國民黨。第二、是否具有國民黨黨員的身份，仍然不失為一種預測是否投票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有效指標；國民黨員的選民傾向於不投民進黨或無黨籍的候選人，唯一的例外是民國80的二屆國代選舉，國民黨員的選民反而有較高的機率去投無黨籍或民社黨的候選人。第三、從上面的發現中，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民主改革的心理需求增強，不但影響著政黨的偏好方向，也直接決定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這也說明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在解嚴

前後的選舉過程中，都扮演著推動現代政黨競爭的一股影響力，而作為反對黨的民進黨，所以獲得選民的投票支持，也得力於此種選民民主價值取向增強的改變。第四、由政黨偏好一直都是決定黨派投票的主要因素，而且影響作用有愈來愈大的趨向看，我們不僅可以發現選民的政黨偏好作為測量主觀政黨感情，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同時也可以看出，選民的政黨偏好是預測選民黨派投票愈來愈重要的解釋變項。從這些發現之中，我們知道個體層次上選民政黨偏好的改變，對黨派投票行為之間具有顯著影響，而選民黨派投票的選舉結果表現在整體層次上，即是政黨重組的效果與政黨勢力的消長。

八、結論

本文上面所分析的，不外在於說明：在臺灣解嚴前後民主轉型期間的選舉過程中，有關選民與政黨之間的交互影響。我們認為臺灣宣布解除戒嚴前後的政治民主化轉型，固然有賴於長期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現代化的條件鋪路，但僅從總體層次的經濟與社會的變遷，來了解臺灣從威權政體轉向於民主鞏固之間的轉變過程，是不充分的而且不免過於簡化，唯有透過探討個體層次的個人價值取向與行為的改變，才能增進我們對臺灣民主化過程的了解。因此，我們分析選民大眾的民主價值取向與黨派投票的變化，並以選民黨派投票的選舉集體結果，亦即政黨勢力的消長與政黨重組的過程，來貫穿我們對選民民主價值與黨派投票行為的分析。

首先，我們認為在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的民主化轉型過程中，選舉與政黨的勢力消長，是一個促發與誘導政治民主化轉型的重要因素，同時我們也從解嚴前後的選舉中，看到政黨勢力的消長與政黨組合的現象。其次，我們為進一步了解這種政黨重組的現象，我們假定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是一個很重要原因，從民主正當信念改變，我們也推論選民政黨偏好的同步改變；同時，我們認為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的改變，必然也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主要原因。

其次，從民國72年至78年之間三次增額立委與80年第二屆國代選舉的

調查資料分析中，我們發現不但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已經具有增強的改變趨勢，同時選民的政黨偏好也有變化。政黨偏好的變化，也說明個體層次政黨組合的過程。從資料的分析結果中，我們了解這種持續性政黨重組的現象，是中立選民逐漸具有黨派性的「政黨組合」過程，亦即傾向於對兩黨表示偏好的選民比率逐漸增加，並非由偏愛一黨改變到另一黨的所謂「解組到重組」的改變。

第三，在分析影響選民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價值取向的個人與社會屬性因素中，我們發現貫穿解嚴前後一直都對具有選著影響作用的因素，乃是選民的性別與教育程度。省籍與黨籍的差異對民主價值取向，則愈來愈不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年齡只在民國 80 年的研究中發現對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具有作用。換言之，男性的、教育程度高的、或本籍的、或非國民黨籍的、或年紀輕的選民，具有比較強烈的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

第四，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因素，以省籍、教育程度、黨籍與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為貫穿解嚴前後且具有顯著影響作用的變項。換言之，本省籍的、非國民黨員、教育程度較低的、及民主價值或民主政黨價值較強烈的選民，顯著地傾向於偏愛民進黨。但隨著解嚴與黨禁的開放，黨籍對選民政黨偏好的影響作用則逐漸變小；代之而起的是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或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由此研究發現，可以預見選民對民主的價值與信念，逐漸成為未來政黨重組與劃分政黨勢力的基礎，選民在社會的分歧對政黨的偏好而言，反而愈來愈成為不重要。

最後，從分析影響選民黨派投票的因素中，我們除了發現省籍與國民黨黨員身份等差異，仍然是影響選民黨派投票的顯著因素之外，我們也發現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對於選民決定黨派投票的影響作用，有愈來愈大的趨勢。這些研究發現都可以說明：個體層次上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的改變，影響著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改變。就總體層次上選舉投票結果的政黨勢力消長與民主化轉型來說，總體層次上的政黨組合，與選民

在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的個體層次上變化，乃是互為影響的過程。從這選舉的情境中，由觀察選民在民主價值與政黨偏好上的改變，再回頭看政黨總體得票率分配之政黨勢力消長過程，則我們對於臺灣在解嚴前後的民主轉型，就可以有多一層的了解。

後記

作者要特別感謝本文所分析資料的原始收集者及問卷設計者，以及資助這些研究資料收集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由於他們的努力與資助，才有這些實證的資料可以運用。作者也要感謝臺灣大學政治系胡佛與陳德禹教授所領導的、歷次選舉之「選民選舉行為研究」的工作同仁，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伊慶春與楊文山教授所共同主持下的「臺灣社會意向調查」工作小組、暨主持與執行「第二屆國代選舉特別調查」之研究同仁；同時，也由於這些研究計劃主持人的慷慨允許作者使用這些資料，本文的分析才有可能。當然，本文的分析與資料的解釋，純屬作者個人，與資料的收集與研究者無關；文中的疏漏與錯誤也固所難免，但概由作者本人負責全責。

附錄一

民主價值取向量表：

- (1) 大家的思想如不一致，社會就會紛亂。(自由權)
- (2)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自由權)
- (3) 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雜亂紛擾，影響到地方的秩序與和諧。(多元權)
- (4) 一個國家如果政黨太多，會導致政治混亂。(多元權)
- (5)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制衡權)

- (6) 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重大的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制衡權)

附錄二

民主政黨的價值取向量表：

- (1) 有強而有力的反對黨，政治才會進步。
- (2) 一般說來，政黨競爭會破壞政治的安定。
- (3) 參加反對黨的人，他們的愛國情操是值得懷疑的。
- (4) 我們國家現在政治已經民主了，實在不應該再強求什麼。
- (5) 如果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做得不好，就應該換別人來做。
- (6) 從解除戒嚴後的變化來看，臺灣實在不適合實行民主政治。

附錄三

政黨偏好的測量題目

72年的測量題目：

右邊有一個階梯圖，一邊表示傾向於國民黨，另一邊表示傾向於所謂的「黨外」，中間表示沒有特定的傾向；在每一邊都有三種程度(1表示較低的程度；2表示中等的程度；3代表較強烈的程度)。

(國民黨) 3 - 2 - 1 - 0 - 1 - 2 - 3 (所謂的「黨外」)

中

間

請問您傾向於那一邊？程度怎樣？

- (1) 國民黨，程度(請填數字)____。
- (2) 所謂的「黨外」，程度(請填數字)____。
- (3) 中間程度。

75年的測量題目：

請比較您對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的偏愛傾向怎樣？(1表示較低的程度，2代表中等程度；3代表較強的程度)。

國民黨	無	民進黨										
3	-	2	-	1	-	0	-	1	-	2	-	3
本人：	<input type="checkbox"/>											

78年的測量題目：

在我們社會裡，有很多人喜歡國民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國民黨；有很多人喜歡民進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民進黨；當然，也有人可能對這兩黨的感覺都差不多，而無任何的偏好；請問您及您的家人對這兩個政黨偏愛的情形怎樣？

(1)中國國民黨：

	喜歡	無	不喜歡	不知道
本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民主進步黨：

	喜歡	無	不喜歡	不知道
本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0年的測量題目：

有人比較喜愛國民黨，也有人比較喜愛民進黨。請問您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喜歡的程度怎樣？

國民黨：(1)很喜歡(2)喜歡(3)不喜歡也不討厭(4)不喜歡(5)很不喜歡

民進黨：(1)很喜歡(2)喜歡(3)不喜歡也不討厭(4)不喜歡(5)很不喜歡

註釋

1 所謂列寧式的政黨，即指一個政黨具有以下列寧所主張的組織策略：(1)

政黨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精英所組成；(2)由上而下的一元化威權結構與嚴格的紀律所控制領導；(3)對黨員意識形態強調並以革命為終身職志；(4)領導幹部的產生經由中央嚴格過濾與甄選；及(5)動員廣大的羣衆支持及為政黨效命。(Fainsod, 1963 : Ch. 3)

- 2 從理論的角度來探討選舉分類的研究，可說應以 V. O. Key 為開始。他將「關鍵性的選舉」視為「是一種選舉的類型，而在該類型的選舉中，不但選民選舉參與的深度與熱烈程度相當高，選舉的結果清楚地改變了選民以前就存在的分歧點。這也許是這種選舉類型的主要區別特徵，在這種選舉中所揭露的重組現象，似乎會在以後的幾次選舉中持續下去。總之，…在這類型的選舉中，選民選舉參與程度很高也很熱烈，因之，一方面會或多或少調整了整個選區中的權力關係，另方面也形成了新的且持續的支持不同政黨之選民羣體。」(Key, 1955: 4)後來，密西根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的 Angus Campbell 等人，在 1960 年出版的「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中，更進一步將選舉分成為「維持性的」(maintaining)、「偏離性的」(deviating)與「重組性的」(realigning)選舉等三種類型(Campbell et al., 1960: 531-38; Campbell, 1966: 63-77)。Philip E. Converse 等人接著也提出所謂的「復原性的(reinstating)」選舉類型(Converse et al., 1961: 269-80)；然而，按照 Gerald Pomper 的看法，所謂復原性的選舉，基本上也只是維持性選舉類型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因此，他認為必須也考慮另一種他稱為「轉向性的(converting)」選舉，這樣選舉的類型才能完備(Pomper, 1967: 535-566)。所以，選舉的類型可分成為四種。總結這四種的選舉分類及其意義如下：「重組性的選舉」專指 Key 所說的「關鍵性的選舉」而言，即在這類的選舉之中，有大量的選民改變他們的政黨效忠，而造成一個新贏得多數支持執政黨的選舉。「維持性的選舉」是指執政的多數黨，仍然一如所預期地贏得選舉勝利而執政，選民支持的基礎正如 Campbell 所說，是因為選民的政黨效忠之整體分配模式，根本上並沒有太大的改

變。Campbell 所界定的「偏離性的選舉」，乃是指在野的少數黨能夠因為短期性的政治態度，如對候選人與選舉議題的態度等，而贏得短暫性的執政地位。Pomper 所加上去的「轉向性的選舉」類型，則指一種執政黨仍然勝選，但其支持選民的基礎已有重大改變之選舉。

- 3 民主價值取向的內涵與量表，主要是胡佛所發展的。胡佛以自主權、平等權、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分權）等五種權力價值的正當信念來界定民主政治文化的內涵，同時也設計四十道測量這五種權力正當信念的題目，經過多次的實證研究與檢討後（胡佛，1982；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78，1980；胡佛、徐火炎，1983），選出最精簡穩定的十一道題用於民國 72、75 與 78 年的立委選舉研究。這些研究也是本文所依據分析的主要資料之一，但本文在操作化界定民主價值取向的內涵時，僅從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正當信念的測量題目來觀察。主要的考慮有二：第一、由於臺灣相當強調平等主義，過去的研究也發現臺灣的民衆普遍具有平等權的正當信念，換言之，平等權的題目比較沒有辨識力。第二，是因為兩道在 72 年與 75 年用的自主權測量題，在 78 年增額立委選舉研究時，卻改由另兩道文字不同的題目所替代；為了能作跨三次不同時間選舉的比較，同時也考慮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的確，假定民衆的自主權信念若以不同的題目去測量而有改變，究竟這種改變是本質上的或文字上的改變？這種問題是值得討論的，但卻非本文所要處理的主題。所以，本文的分析僅採三次研究都用文字相同的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測量題目，來給民主價值取向下操作性的定義。基本上，這三種內涵的權力正當信念，也是過去臺灣民衆最不普遍具有的、但卻是民主價值取向的核心內涵，由這三種權力取向的正當信念來看民衆的民主價值取向，頗具有辨識力。
- 4 本研究中所謂政黨偏好，比較強調主觀的喜歡或不喜歡的情感態度，而雷飛龍、陳義彥等人（1987，1991）對「政黨偏好」的測量方法，則比較屬於是一種測量選民對政黨的接近性（party closeness），這種測量方法常

被用於跨國比較研究(Barnes, Kaase, et al., 1979; Barnes, et al., 1988)。他們所發展的測量題目(用於民國75年選舉)是：

社會上常聽人家說自己是「黨內的」或「黨外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或者都不是？(黨內的、黨外的)

若回答「都不是」、「不知道」或「不願回答」，則續問：

那麼您覺得自己比較偏向黨內還是黨外？或者都不偏？(偏黨內、都不偏、偏黨外、不知道、不願回答)

用於民國78年選舉的政黨偏好量表，則將上述問題的文字由「黨內的」換成「國民黨的」、「黨外的」改成「民進黨的」，以符合解嚴與黨禁開放後的實際狀況。

5 本文的匿名審查人之一，亦指出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反對勢力與運動多年來一直對選民強調，制衡是『黨外(或民進黨)制衡國民黨』的說法，因此令選民無法了解分權與制衡的原理。」所以，該審查人認為選民對制衡權測量題「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的回答不同意(即不具制衡權取向)的比率降低，也可能在於這測量題的「效度」問題上。本文作者認為這雖然不失一種可能的解釋，但仍待以後進一步驗證是否是效度的問題，因此特別說明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6 Przeworski (1988 : 66)在其他地方，也再次強調這個論點：「在一定的經濟、意識形態、組織與相關的資源分配上，只有存在某種制度可以讓競爭的政治過程，不會導致對每一方都極為不利結果的條件下，民主才能建立。」

7 本文原先對依變項(選民黨派投票)，做下列的量化處理：投國民黨候選人的給-1分，投其他黨籍或無黨籍候選人的登錄為0分，而72年選舉投「黨外」、75年以後的選舉投民進黨候選人的選民，登錄為+1分；並以這樣的處理方式進行迴歸分析。這樣的處理乃是根據 Michael W. Gillespie (1977)的看法，認為虛擬化或有限變量屬質性依變項(dummy

or limited dependent "qualitative" variables)的迴歸分析，雖然違反了迴歸分析對依變項的基本假定，但若依變項的百分比分配介於 25 與 75 之間而不會呈現出極端的分配，迴歸分析仍然不失為一種探討變項之間理論上關係的一種可行方法。但由於一位匿名的審查者建議以「洛基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來分析，比較能符合依變項的測量性質，作者同意這種看法。同時作者也認為既然這種複雜的統計分析，在目前電腦與統計軟體進步情形下已經不成問題，而且這種符合測量性質的統計方法，應像其他的政治學界所習用的統計方法一樣，逐漸由引介討論以至於普遍應用，以符合變項測量的性質。

8 既然洛基迴歸以最大可能性估計法，來求解解釋變項的對數估計值，虛擬化的總變異量百分比值(pseudo R-square)，乃是類似一般最小平方法迴歸分析的一種評估洛基模型的指標(goodness-of-fit measure)。本文所採用的計算方式，乃是根據 Aldrich and Nelson (1984: 57) 的公式而來：Pseudo R-square = C/(N+C)，C 為 the chi-square statistics，亦即為表中的-2LLR 值，N 即為有效的樣本數。這種計算法，按照 Hale and Mitchell II (1992: 782) 的分析與比較，仍然可說是一種頗能符合理論預期的計算方式。

9 在兩分的(Y=1,0) 洛基迴歸分析中，選擇 Y=1 機率的估計式為：

$$P(\text{選擇} Y = 1) = \frac{1}{1+e^{-Z}}$$

其中，e 是自然對數；Z 是解釋變項的線性組合，如同一般最小平方法的迴歸方程式： $Z = B_0 + B_1 X_1 + B_2 X_2 + \cdots + B_k X_k$

在兩分的洛基分析中，只要把 log odds 的估計值代進上式的機率估計式，即可計算出選擇的機率。但在多分的洛基分析模型中，雖然估計式只是從兩元的估計式加以推廣擴大而已，但由於涉及到另一種可能選擇，選擇的機率是屬於條件式的機率。由於計算選擇機率的繁複，而發展以解釋變項的導數值來計算這種條件機率。從解釋變項的導數值來推估選民進黨機率的計算方式如下：

$$\begin{aligned}
 \text{本省籍} &= 0.995(1) + \\
 \text{非國民黨員} &= -.0969(0) + \\
 \text{具有強烈民主價值取向} &= .0076(18) + \\
 \text{強烈偏好民進黨} &= .0848(7) + \\
 &= .8306 > .50
 \end{aligned}$$

由於機率大於 .5，所以選民去投民進黨票的機率就很可能發生。

參考資料

胡佛

1982 「有權與無權：政治價值取向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之10，頁381-416。

胡佛、徐火炎

1983 「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與面向的探討」，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12)，第三次社會指標會議論文集(上冊)，頁47-82。

胡佛、陳德禹、朱志宏

1978 「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27：3-38。

1980 「政治系統的權力價值取向及交互作用：內湖地區個案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結果報告。

徐火炎

1991 「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臺灣地區選民的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1)：1-57。

雷飛龍、陳義彥等人

1987 「轉型期社會中的投票行為——臺灣地區選民的科際整合研究(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結果報告。

- 1991 「臺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結果報告。
- Aldrich, John H., and Forrest D. Nelson
- 1984 *Linear Probability,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Sage University Paper Series on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07-045.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Pubns.
- Barnes, Samuel H., Max Kaase, et al.
-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arnes, Samuel H., et al.
- 1988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arty Closen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tical Behavior* 10(3): 215-31.
- Beck, Paul A.
- 1986 "Choice, Context, and Consequence: Beaten and Unbeaten Paths toward a Science of Electoral Behavior," In Herbert Weisberg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Inc.
- Campbell, Angus, et al.
-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Cnudde, Charles F., and Deane E. Neubauer, eds.
- 1969 *Empirical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IL: Markham Publishing Co.
- Converse, Philip E.
- 1961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1960: A Reinstating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 269-80.
- 1966 "The Concept of Normal Vote," In Campbell, et al. (ed.)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John Wiley.

-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 1-40.
- Fainsod, Merle
1963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espie, Michael W.
1977 "Log-Linear Techniques an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ummy Dependent Variables: Further Bases for Comparis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6(1): 103-122.
- Hagle, Timothy M., and Glenn E. Mitchell II.
1992 "Goodness-of-Fit Measures for Probit and Logi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3): 762-784.
- Hu, Fu, and Yun-Han Chu
1992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71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3: 283-322.
1984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2): 193-218.
- Inglehart, Ronald, and Avram Hoschstein
1972 "Alignment and Dealignment of the Electorat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 343-72.
- Key, V. O., Jr.
1955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17: 3-18.

- 1959 "Secular Realignment and the Party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21: 198-210.
- Lipset, Seymour Martin
-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69-105.
- Maddala, G. S.
- 1983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 1979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2nd.) Enlarge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uillermo A.
-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omper, Gerald M.
- 1967 "Classification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29: 535-66.
- Przeworski, Adam
-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A. O'Donnell, et al. (e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8 "Democracy as A Contingent Outcome of Conflicts," In Joh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 (ed.),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ye, Lucian W.
-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teinberg, Dan.
- 1985 *Logit: A Supplementary Module for SYSTAT*. Salford Systems.
- Wattenberg, Martin P.
- 1981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Partisa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Negative or Neutr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 941-50.
- 1984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52-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nckler, Edwin A.
- 1984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China Quarterly* 99: 481-99.

**Party Realignment in a Democratic Transition:
A Study of Changes in Democratic Values,
Party Preferences and Vote-Choices
among Taiwanese Voters**

Huoyan Shyu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by lifting martial law is hardly explained by looking only at its preconditions of socio-economic changes at the macro level without exploring those changes in individual attitudes, values and behaviors of the mass at the micro level. Electoral changes in popular vote-shar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1980s is identified as a secular trend of party realignment, a synchronized mass political change as Taiwan was taking off economically. A upward trend of growing democratic values as well as changes in partisan preference toward the opposition, the DPP, is analyzed to signify the party alignment found in the 1980s. Voters' democratic values are thus found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artisan preferences, and both are contributing to predict partisan vote-choices in the elections. It is found that Taiwan's secular party realignment trend occurred in the 1980s is neither of the so-called "dealignment-realignment" process nor of a "switching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henomenon. It is simply a trend of electoral change in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non-partisan vot-

ers has become more partisan, which is a result of increasing intensified par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mobi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se changes in individual democratic values, party preferences and partisan vote-choices are asserted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and interacting with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